

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郝幸艳

为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进一步推动抗战史与台湾问题的相关研究,2015 年 10 月 24—2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的百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论文 85 篇。会议围绕早期日本侵台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殖民台湾史、台湾光复与重建、台湾光复的法律问题与历史记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展示了学界研究的新进展。

一、关于早期日本侵台与中国人民反抗问题研究

台湾因特殊的地理条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因此成为日本等国觊觎、侵略的对象。台北中研院宋光宇考察了台湾原住民从华南迁来,向山地发展,又向南发展的迁移路径,梳理了台湾确立其海上丝路枢纽地位的演变过程。近代台湾问题的由来,很大程度上与日本蓄谋侵略台湾有直接关系。1871 年的“琉球漂流民事件”,被日本利用作为出兵台湾和占领琉球的借口。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郝祥满等人考察了事件发生后日本的策略,并检讨了清政府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中的失误。1874 年发生的日本图谋侵占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对清政府理台政策的调整和国防政策的出台有直接影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祖基详细考察了该事件中日本侵台之策划与准备、侵台军事行动之实施、中国方面的反应与对策、沈葆楨渡台加强防务、中日交涉与中日《北京专约》的签订,指出清政府处理善后的失当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为其并吞琉球及 20 年后发动甲午战争和强行割占台湾埋下了祸根。

日本、荷兰、德国等外国势力在觊觎台湾的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明争暗斗。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思指出,日荷在台海贸易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这场冲突的走向,弥补了学界以往忽视早期日荷冲突也受制于当时台海贸易格局这一历史背景的缺憾。针对学界普遍关注日本侵台的研究现状,北京印刷学院人文社科部李益波将目光转向了德国,指出德国在日本割台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而日本割台成功又反过来刺激了德国强占中国沿海据点的狂热野心。

日本侵台震动中国朝野,官方和民众的反应与应对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天忠等人探讨了丁日昌对抚闽与督台之间关联的思考,对台湾的规划与经略,以及遇到的人事关系等方面的掣肘。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许维勤、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谢

必震则分别论述了沈葆楨在受命处理“台湾事件”时的治台方略,认为其改革台湾行政设置划分,“开山抚番”,加强海防军事实力,整饬吏治、营制、民风,开办近代化事业等措施,为后来台湾建省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政府在强烈的边疆危机下开始进一步谋划台湾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小叶全面梳理了从日本侵台到中法战争十年间,台湾建省问题从提出到落实的过程,揭示了在建省“幕后”地方督抚之间复杂的人事纠葛,指出“吏治”与“经费”是影响台湾建省决策的核心问题。

1895 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后,两岸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保台斗争,涌现出一批抗日保台志士。台湾世新大学王晓波针对某些政客抹煞台湾人民抗争的历史和歌颂日本殖民统治的“皇民化”倾向,用丰富的史料再现了日军在台湾的血腥暴行,以及吴汤兴、徐骧、姜绍祖、刘永福等先烈誓死抵抗的壮举。嘉应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林振武等人通过对丘逢甲组织义勇军抗战,为台湾抗战正名,高度评价了丘逢甲为台湾回归祖国做出的贡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徐博东等人则对抗日义军统领吴汤兴、徐骧、邱国霖的大陆祖籍进行了考证。

二、关于日本殖民台湾史研究

日本对台湾施行殖民统治政策,使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多重变化,对台湾影响深远。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向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此次会议也有较多的论文。

关于日本在中国台湾、东北地区及朝鲜殖民统治的比较研究。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许介麟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从历史文化底蕴、日本的殖民统治方式以及反抗方式等角度,剖析了同为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能够拂拭日本殖民统治的伤痕,让日本人肃然起敬的原因。韩国国民大学国史学科文明基通过对台湾与朝鲜警察制度的比较,认为朝鲜因缺乏一个足以让现代式的价值得以内面化或被强制推行的“训练的场所”,很难说存在着“殖民现代性”。辽宁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孟月明指出,日本在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实行的农业移民政策看似有很大地域差异,实则异曲同工,都是日本对华殖民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体系问题,是日本学界近 20 年来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王铁军系统梳理、归纳了日本学者关于台湾殖民统治体制研究的主要面相、最新动态,为学界探讨台湾殖民统治体制提供了借鉴。

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确立后,台湾土人群体、工人运动、大陆官民对台胞的情感,乃至客家族群的称谓均发生新的变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杨齐福考察了日据初期台湾土人群体的内在心路及行为抉择,进而探究台湾土人群体复杂的政治理念。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帮强考察了台共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扮演的角色和领导工人运动失利的原因。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尤淑君梳理了 1894 年至 1949 年中国官民对台湾形象的认识及情感变化,指出其最初愤于日本割台,随着台湾籍民犯罪率的高升转为厌恶,对台湾民众被日本强招入伍则怜恨交加,“二二八事件”后又由指责到同情。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郑政诚揭示了客家族群依原乡概念、语言、风俗习惯等多元方式判定自我与他族的方法,向以“语言”作为自身族群认同标准的变化。

日本殖民期间台湾的经济问题,也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周翔鹤针对台湾学者柯志明质疑川野重任“甘蔗北上侵入中北部水田”的说法,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米糖相剋”,主要发生于中部和中北部,印证了川野重任的说法。制糖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产生了稻蔗争地问题,也导致糖业资本家与蔗农之间的土地权益纠纷,引发了“二林事件”和“凤山事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以李应章和简吉为例,探

究了二人与“二林事件”的关系,并进一步阐明了两人及其家属的日后遭遇,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方菁英,为启迪农民自觉意识所付出的代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博强考察了台湾的盐政殖民化,指出其实质是将清政府时期的盐业专卖制度实现重构,是台湾总督府构建殖民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

统计数据是研究经济的重要根据。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冈崎滋树以农业为例对台湾总督府统计数据进行史料批判,认为学界对农业统计数据的检讨,重在修正农业整体或各农产品的“生产额”,而忽略了它的“生产量”,但“生产额”与“生产量”是两个不一样的指标,“生产额”并不总是正确地反映实际生产状况。

华南历来是台湾货物输出市场,华南产业开发即是日本图谋获取中国资源而制定的产业规划,是日本对台湾经济殖民的重要一环。台北“国史馆”文献馆颜义芳根据台湾总督府的华南产业调查,探讨了日本经营华南产业的状况、经营态度及策略运作,指出日本推行华南产业开发政策目的是以华南为作战后援补给基地。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张晓辉指出台货作为日本对华南乃至东南亚市场实行商品倾销的重要生力军,加剧了岭南与台湾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

日本不仅通过控制华南产业开发实现对台湾的经济殖民,还试图进一步控制华南的教育。台湾“国家教育研究院”陈妙娟通过考察厦门、福州、汕头等地籍民学校的设立、设施、教育对策及运营方式,探讨了台湾总督府华南教育政策的施行脉络及实质。

也有学者从医疗卫生、宗教等角度,深入透视日本的殖民政策。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傅琪贻,以泰雅族番地“公医”日野三郎(Losin Watan)为观察视角,凸显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通过“教育”与“操纵”进行“理番”政策的特色。嘉应学院社会科学教育部崔晓阳指出,台湾长老会1895年至1930年发展较为自由,1931年至1945年逐步受到军国主义的控制,转而逢迎殖民统治者,甚至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三、关于台湾光复与重建问题研究

台湾能够顺利收复,与社会各界的民意及国民党前期的基础性工作不无关系。本次会议对此多有关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小冲,利用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的内部报告和亲历者日记,论证了台湾民众50年坚持不懈地奋力反抗殖民统治,乃是台湾光复的重要政治基础。他通过对台湾民众激烈反抗日本占据与发自内心的欢迎祖国接收的对比,驳斥了某些学者、政客认为台湾人对历史上外来侵略与殖民统治并不在乎的荒谬结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邓孔昭指出台湾调查委员会中的台籍人士,编译各种有关台湾资料书刊、培训台湾干部、对制定接收政策建言献策,为台湾的顺利接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张元等人考察了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为台湾光复开展的组织与训练、舆论宣传等各项工作与活动,分析了其历史作用以及社会实践能量释放不足的局限性。福建省档案馆林真指出福建地方政府和人民对台胞抗日复台活动的支持,对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建设和管理台湾等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蒋介石对战后台湾问题和对日处置的思考,以及国民党外交、人事等方面的准备工作也是收复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冯琳利用蒋介石日记等史料,分析了开罗会议前蒋考虑台湾问题的脉络、对台湾的定位、应收复台湾地区区域范围的变化、收复策略等,丰富了学界对蒋在台湾问题上心路历程的认知。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开始设想和规划战后对日处置问题。浙江大学历史学系肖如平考述了蒋介石在对日和约交涉中的政策演变,揭示了其由光复初期“以德报怨”,到美国拒绝台湾当局参加对日和约签字后力谋参加“中日双边和约”的过程。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廖大伟指出复台准备工作是在 1944 年 3 月 15 日蒋介石下令启动之前,真正收复工作的准备始于《开罗宣言》发表之后,并进一步考察了蒋介石关于台湾收复后的定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军指出,在开罗会议前,扶植中国为四强之一,英美已基本达成共识,台湾是否明确宣布归还中国,仍存在分歧,经英美多方沟通和国民政府在开罗会议上的争取,最终确立了台湾、澎湖、东北等地必须归还中国的法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贺渊则着力研究陈仪在闽台两地建立人事行政制度的过程、方法和努力,指出陈仪有所作为,但囿于种种因素,最终没能完成从行政长官体制到宪政体制的过渡。

以往有关接收台湾日本海军的状况,大多参考《台湾接收总报告书》和李世甲与严寿华的回忆录。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沈天羽等人以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李世甲电文档案为参照,考证了《台湾接收总报告书》和电文的部分差异,补充了基隆、台北、高雄、澎湖日本海军的接收实况。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郑梓等人引用中美双方的档案及资料库中的军用地图等图像资料,梳理了驻华美军拟订占领台湾计划纲要的过程,以及国民党政府从最初“收复台湾五项要点”“台湾省收复计划大纲”,到最终修订为“台湾省占领计划”的始末。

国民党接收过程并不顺利,存在诸多矛盾,其间存在的不当操作也为日后省籍矛盾的爆发埋下隐患。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何卓恩根据学界尚未充分利用的罗宗洛日记等史料,考察了台北帝国大学接收改组过程中存在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指出光复解决了国族的问题,光复后不够合理的管制方式却衍生了省籍的问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曹艺以台湾省党部为例,分析了台籍精英光复台湾前的筹划,对复台、接收工作的主张,对改革省政的呼吁,以及国民政府对台籍精英诉求重视不够等,揭示了国民政府在战后收复台湾问题上的缺失及对此后台湾局势的影响。

台湾光复后琉球和南海诸岛的归属问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福建省委党校徐文彬考察了抗战胜利后福建有识之士吁请收复琉球,并策动琉球革命同志会活动的过程。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金智考察了抗战胜利后海军收复南海诸岛的情形,论证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具有实际管辖主权。台湾光复后,被日本征召到大陆参战的台胞出现了一股返台热潮。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宋淑玉考察了光复初期大陆台胞的数量与分布、参与台胞返籍的组织及台胞返籍进程等问题。

在经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压榨及战火摧残后,台湾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亟待恢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黄俊凌,针对台湾学者苏瑶崇有关台湾善后救济分署平售救济面粉时“产生了一连串的弊端”的说法,提出不同见解,认为救济署信息公开透明、价格优惠、购买程序合理,对粮价高涨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应予以肯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冯健伦指出日本战败至光复前期间,台湾总督府与行政长官公署在执行经济政策时的博弈,使深受战时影响的台湾金融体制变得更加孱弱。

台湾光复以后面临着大量社会重建的任务,其中民族文化重建是一项艰巨而具有深远意义的任务。消除日本在台残留的“皇民化”遗毒,重建中国认同是当时文化重建工作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陈建樾探讨了光复初期的国语政策和在台湾原住民地区展开的理念支持与思想脉络,指出了国民政府推行国语政策过程中存在的缺失,认为国族整合如果不注意具体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立场与利益,民族语言将会成为“斗争之场”。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研究所杨森考察了国民政府推行国语运动的措施、成效与不足,指出早期国语运动初见成效,随着出现操之过急、政治挂帅等失误,导致了省籍矛盾激化,国语运动受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赵立彬考察了《新生报》创刊初期试图在台湾民众中重新树立中国的国家意识的努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并检讨了其理想主义色彩的局限性。闽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施沛琳指出,光复

初期,面对台湾存在的文化差异,国民政府文化重建工作不当造成台湾人产生“文化适应不良症”,继而造成文化与社会冲突。

许寿裳对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福建社会科学院杨彦杰重点考察许寿裳对台湾文化重建工作的思考和前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补充考订了许寿裳赴台原因、在台生活史、与台湾省编译馆人事关系等问题,重新诠释了许在台文化重建工作之意义,认为与其说文化重建是导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还不如说是“二二八事件”打断了正常的文化重建工作的进程,指出今后在研究台湾光复及相关历史问题时,要高度警惕历史悲情之下的过度诠释与史观错位。

台湾文化重建工作并没有彻底清除日本“皇民化”遗毒,日后被台湾政界和日本政界的右翼亲台势力利用,糅合了“日本情结”“日本因素”甚至“日本化”的“亲日”现象在台湾益发兴盛,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延伸至今。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李中邦考察了台湾各个领域存在的“亲日”现象,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李跃乾指出李登辉是“日本精神”的代表,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用“日本精神”指导“台独”势力进行建立“台湾国”的活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林晓光探讨了日本政界右翼亲台势力“台湾帮”的缘起与形成及其与台独势力的勾连,从历史、经济、安全、战略的角度分析了“台湾帮”竭力介入台湾问题的原因,以及对中国统一、中日关系造成的不良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键指出当前日本极力推动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是出于制约中国(亦平衡日美关系)的战略考量,并预测《台湾关系法》的“变现性”面临巨大的困难。

四、关于台湾光复的法律问题与历史记忆问题研究

所谓台湾地位问题,是由近代日本侵略的历史造成的,条约则是记载这一过程的法律文书,反映了台湾法律地位的演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育民从中日《北京专约》等与台湾法律地位相关的条约入手,考察了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变迁,日、美等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与实质,揭示了条约变化对台湾法律地位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郑海麟论证了战后一系列对日处分条约的合理性,厘清了一些错误的认识,为战后台湾及南海诸岛主权重归中国提供了历史与法理依据。针对台湾法律地位存在的争论,指出欲解决该问题,签订条约及条约生效日期是两个需要把握的关键因素。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王伟男指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本质是美国基于其亚太战略考量,公然违背国际正义和国际法的强权政治,并不具有积极的国际法意义。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钮维敢认为中国主流学术界将旧金山体制与雅尔塔体制判定为从属关系,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将造成中国对日本申索中国固有领土主权的两种逻辑相矛盾。

学界关于台湾、澎湖法律地位的成果较为丰富,但对台湾当局围绕对日和约所展开的因应策略中,最核心的台澎地位问题则欠缺系统深入的专论。龙岩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刘玉山指出国民政府的因应策略为“主权自表,不予对抗,力博同情”,而对其他常规问题则采取“予以接受,通力合作”的策略,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没有改变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约文本措辞。

历史记忆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台湾中山大学通识中心陈世岳揭示了国民党、共产党、日本控制区,以及中国台湾岛民对战争记忆的多元形态,指出两岸的战争记忆与战争纪念反映的是不同的政治经历和不同的政治情境,实质是争夺历史记忆的话语权。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潘宗忆通过检视“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兴建过程,论证了台湾多元社群二战“战争

记忆”之“记忆战争”,实为台湾先后受日本殖民统治与中华民国统治的特别历史发展脉络、多元社群移民历史经验的结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双文考察了台湾出版的几种口述历史著作,指出了其中有关粤系军人部分存在的四个谬误,以慎重谨严的态度还原了历史史实。

教科书是重要的记忆媒介。江苏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薛伟强探讨了两岸中学历史教育中关于抗日战争历史书写的差异,指出了书写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呼吁海峡两岸应努力克服意识形态束缚,“共享史料、共写史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郝幸艳以《海峡评论》刊登的台湾统独双方关于“98 课纲”的论战为观察视角,探讨了双方论战的主要议题、对历史诠释权竞夺的运作方式,指出历史诠释权竞夺的实质是“去中国化”与反“去中国化”的政治对抗。

报刊也是保留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忠纯指出当时国内知识界的一些言论,在反帝反殖民的“东方革命”话语中,将台湾视为亚洲“弱小民族”的一员,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统治有了当然的合法性,而“台湾民族”的提法是当时“民族自决”理论、“民族”概念的产物,有着特定的政治意义。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许毓良详细介绍了 1947 年至 1948 年大陆期刊、杂志对台湾的观感和对魏道明治台功过的历史评价。福建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化学教研部林星选取 1946 年 10 月京沪平昆记者团赴台访问的个案,反映了记者团所见光复初期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状况,探讨了记者团此行的影响和大陆赴台人士的台湾经验。

五、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关于清前期台湾史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宏斌考察了福建台湾府划分内洋与外洋的情况,以及水师的管辖范围。该文的重要贡献在于通过 1752 年刊刻的《重修台湾县志》,从环台湾海道是中国的外洋,属于水师管辖范围的角度立论,对清代关于钓鱼岛的管辖权进一步提出新的补证。

1919 年,福州台江日本侨民与中国民众的一场殴斗冲突引发的“福州事件”,掀起了五四运动后期全国性抵制日货和排日运动的高潮。1924 年,由厦门地方势力及侦探队与日籍台人之间的武力冲突引起的“台探事件”也轰动一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叶磊、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郝天豪等人分别考察了这两起事件的全过程,并探讨了事件对当地、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关于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指出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对于当下实现“中国梦”的启迪意义。

国民党向来重视华侨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庆云指出,1949 年后国民党政府在新西兰的华侨工作,核心要义为“反共防共”,并以策动华侨“反共防共”作为遏止新西兰承认中共政权的重要途径,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小平指出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经济政策改革的起因在于应对美国经济援助的停止,美国是外在推动力,而非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官员务实的态度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的传播,则为改革提供了方向。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的围绕农地政策改革方向的争论,尚未引起学界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程朝云通过对此次争论内容的梳理与分析,考察了争论背后的农业发展与农地政策思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战后台湾的农地政策演变与农业发展道路选择。

广东省档案馆黄菊艳详细介绍了其馆所藏的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前和战后形成的与台湾有关的

历史档案,为抗战史和台湾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

针对学界很少从宗教角度探究战后台湾局势的现状,台湾台中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任天豪爬梳了退据台湾的国民党在面对来自日本的创价学会及公明党时,如何思考并因应的历程。

另外,关于客家人与抗战护台的论文在会议上也进行了初步交流,并在梅州举行的“客家人与抗战”学术论坛上展开进一步讨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吉奎介绍了梅州籍人士和梅州籍客家人在台湾的活动,嘉应学院肖文评等人缅怀了抗战英雄罗卓英等两岸客家人抗击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刘加洪等人高度评价了两岸客家人为台湾回归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周云水考察了客家抗战老兵在身份认同上的纠结。

六、结语

这次会议虽然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与民族复兴”为主题,但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涉及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台湾史的诸多方面。简而言之,如李细珠所述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涉及面广,包括从台湾古史到当代台湾史的多方面问题;二是推陈出新,老问题有新看法,并提出了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推进了相关研究;三是纠正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得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结论;四是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如对蒋介石日记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档案资料的充分利用。学术研究需要在既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前进,需要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利用新资料,得出新的结论。这次会议正反映了这种继往开来的学术精神。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大大地丰富了对会议主题的认识,有助于把台湾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台湾史研究向前推进。

〔作者郝幸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郭 蕾)